

试论在市场经济文化语境下王安忆的精神内迹

作者：吕梁高等专科学校 高丽华

[摘要] 在市场经济文化语境下 20 世纪 90 年代的文坛人文精神普遍疲软，王安忆却高擎起纯粹的精神旗帜，以张扬个人的精神世界来拒绝现实世界的侵犯，尝试着知识分子精神上自我救赎的努力，本文通过对王安忆连续发表的三部中篇小说：《叔叔的故事》（1990 年）、《歌星日本来》（1990 年）和《乌托邦诗篇》（1991 年）详细的分析，试图走进王安忆的精神世界。因为这三部作品分别以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时间向度来重新整合 80 年代破碎了的精神传统，从时间的向度上能较为清晰的看到王安忆的精神轨迹。透过这种努力我们看到王安忆的精神内迹充满了矛盾和困惑，而这样的精神救赎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下最终使她陷入“高处不胜寒”的境地。

[关键词] 市场经济文化语境；王安忆；精神内迹

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文坛，人文精神普遍疲软，相当一部分作家放弃了 80 年代的精英立场而转向民间，大部分作家通过个人性话语以消解政治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神话。此时的王安忆却高擎起纯粹的精神旗帜，尝试着知识分子精神上自我救赎的努力。这种努力采取了低调的姿态：回避与现实世界的直接冲突，却以张扬个人的精神世界来拒绝现实世界的侵犯，试图重新捡拾起被时代碾碎了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话语。1990 年冬开始三两年之内发表了一系列密集又重大的作品，进行着她“世界观重建的工作”，并声称自己的小说为“创造世界方法之一”。本文就王安忆连续发表的三部中篇小说：《叔叔的故事》（1990 年）、《歌星日本来》（1990 年）和《乌托邦诗篇》（1991 年）作一较为详细的分析，试图走进王安忆的精神世界。因为这三部作品分别以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时间向度来重新整合 80 年代破碎了的精神传统，从时间的向度上能较为清晰的看到王安忆的精神轨迹。

在《叔叔的故事》这一文本中，王安忆于平淡舒缓的叙述下掩藏着强烈的对知识分子的道德焦虑。叔叔本来属于启蒙和革命时代的人物，他们与“五四”以后的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既对中国革命有过纯真的信念和狂热的激情，同时也受西方人文主义的深刻影响，而人文主义的信念——“每个人在他或她自己的身上都是有价值的——我们仍用文艺复兴时期的话，叫做人的尊严——其他一切价值的根源和人权的根源就是对此的尊重。”更符合知识分子内心解放的需要。叔叔比旁人的特殊之处，也是小说吸引读者的地方，是旺盛的生命本能/欲望本能与 1949 年以后建立的主流意识形态对此进行不断压抑形成的强烈的冲突。而 1949 年以后的中国，其革命伦理规范以及社会意识形态对此都是剔除和摒弃的。“叔叔”试图抗争过这一历史的宿命，与自己的女学生发生过暧昧的关系，可只落得个人性和人格扭曲的下场。而他以后的工农化、粗俗化甚至自轻自贱，表面



上使他获得了“新生”，其实却是知识分子主体的断裂和沉沦。

叔叔是“年轻得还没来得及谈恋爱”就稀里糊涂地划成右派被赶到乡下，之后就立刻陷于农民文化之中，他放弃了个人主义和浪漫情怀，一步步地撕裂自己——将自己从西方人文主义的理想天国中返回到粗砺的中国大地，从思想到身体全面转移到农民文化的怀抱中——要比农民还农民。他的婚姻很符合时代的要求，他和她的农村女学生结了婚，王安忆不无揶揄地说，这婚姻形式里“含有一个朴素的自然人与一个文化人的情爱关系；又有一个自由民与一个流放犯的情爱关系”。可随着时代的转换，叔叔终将抛妻弃子，走上一条与传统道德背弃的道路。小说描写了知识分子受西方现代文化影响熏陶的顽固沉淀，写出了叔叔的精神对身体的控制和失控、身体与环境时空的互动情况，以考察知识分子身体和性的历史发展。

维特根斯坦曾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人的身体是人的灵魂的最好的图画。《叔叔的故事》不仅注意到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对人的身体压抑的规范，而且设置了人的身体的活动的情境，身体一方面受制于具体的文化生活和社会秩序，另一方面也随历史境遇的变化而变化。《叔叔的故事》以空间的更换表现出“世界身体”、“社会身体”和“政治身体”的一面（根据社会学家约翰·奥尼尔的五种分类法，此为其中的三种），并以此败露知识分子的灵魂的伤口所在，阅读以后让人深思。

叔叔经历过历史的痛苦以后，由写小说而发达，“由于写小说这一门工作，他的人生竟没有一点浪费，每一点每一滴都有用处。”小说拯救了叔叔，使这只苦守于乡野小镇的不死之蛹化蝶飞翩在城市的上空和自己粉红色的卧室里，他还常常飞到国外，“他好像是一个现代的普罗米修斯，他崇高的苦难是他宝贵的财富，供他作出不同凡响的小说，还供他俘虏女孩子。”叔叔成为社会名流之后，便开始走向了纵欲主义，并以此作为对知识分子苦难历史的补偿和对以往政治强制肉体的报复。这体现了知识分子精神形态中的残缺：在无爱的身体与性的游戏中虽达到了自我陶醉并得到了别人的艳羡但内里则是精神的空虚、孤独，失去了“爱”的能力的表现。在小说中尽管叔叔是社会名流、成功人士，但揭开这辉煌美丽的面纱，异化的丑陋却令人震惊。

阅读这部小说，可以让我们想起九十年代中国学界的两场论争。一是关于人文精神是否失落的讨论，二是紧随其后的关于“后启蒙”的论争。这两场论争的核心问题都是为了寻求八十年代启蒙之后，在市场经济的文化语境下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发展的方位。可惜的是，由于相当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近年来心灵的浮躁和对名利的过度追逐，他们不仅对八十年代的中国式启蒙失去深切的回忆和深刻的认识，而且还通过一味地描绘、鼓吹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假象”为己所用。《叔叔的故事》对上述危机的揭示是清醒的。叔叔在市场对人文写作排挤和冲击的情况下，抱着将写作游戏化和职业化的态度，利用传统的民众对作家神圣感和迷信多多地攫取。如果人文知识分子尚且如此，如果他们立足于世首先要照顾和满足的是自己“沉重的肉体”，就像肉欲十足的叔叔一样，那么民众也可能抛弃这样无限肉身化的知识分子。

如果说《叔叔的故事》是对一个时代的总结和检讨，也是对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尖锐冲突的揭示和反省，那么《歌星日本来》则讲述了知识分子人文传统所面临的另一个挑战：市场经济对人文精神的挑战。这个文本描述的是关于一个日籍歌星与内地小歌舞团联袂走穴的故事。一个来自民间的歌舞团班子，在“文革”时为了配合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依靠政治权力和群众运动结合成一个交响乐队。而当时代发生变化时，由于其赖以生存的基础——政治需要荡然无存，这个小歌舞团也就面临倒闭的危机，最后为了生存与日籍歌星联袂走向市场。小歌舞团虽然成了政治运动的牺牲品，但是在狂热普及交响乐的运动中毕竟唤醒了许多音乐爱好者对艺术的追求热情，他们为了追求艺术奉献出自己最美丽的青春和梦想，当时代发生深刻的变化时，这些交响乐的追随者们也发生了分化，有像瞿小松那样的前程远大者，但更多的是阿兴和叙事人的丈夫那样被碾到时代巨轮之下的牺牲者。他们不得不目睹自己输给一些极其鄙俗的商业“艺术”，正如那个在茫茫人海悲怆地孤军作战的日籍歌



星。作者对此充满了深切的悼亡之情。如有这样一个晚上，单簧管手阿兴白天吹着趋时的萨克管，到了晚上，“夜深人静，他悄悄地从床上爬起，也不开灯，摸到了放在窗下的单簧管盒子。他打开，一件一件装好，手指掀着键，键钮发出轻快地喳喳声，在月光下烁烁作亮。他感觉到键钮在手指上的凉意，一阵彻心的酸楚涌上心头”。没有议论，没有暗示，悼亡的感情饱满地体现在具体的人物动作之中。

王安忆通过对“叔叔”这类人的冷静解剖以及对日籍歌星孤军奋战的走穴和歌舞团吵吵嚷嚷的商业行为的描写，宣布了“古典浪漫主义”的终结。但她并没有放弃知识分子的人间情怀和对人文理想的追寻，这一点在我们接下来要分析的《乌托邦诗篇》里看得较为清楚。

作为一种有着不自满精神性的生物，很久以来，人类都觉得自己生活的社会不够美好，他们相信在某个难以达到的地方，那里的人们过着从物质到精神都远比自己目前的生活要优越得多的生活。无论中西，都有人阐述过这种梦想。中国老子的“小国寡民”，陶渊明的“桃花源”，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英国莫尔的“乌托邦”，无不是这种理想的体现。王安忆在《乌托邦诗篇》里也表达了自己这种美好的愿望。

王安忆曾称自己是“没有信仰的一代”，而在《乌托邦诗篇》中王安忆以昂扬的姿态确立了信仰，为理想主义正了名，并深情地写到：“我好像又回到了我最初时期，那是人生的古典主义时期”。其实知识分子并不是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某个阶级，他是人类源远流长的人文精神传统的派生体，王安忆经过反省、悼亡以后走向了对知识分子人文精神重建理想的新生阶段，这也是《乌托邦诗篇》的核心。

“乌托邦”是自古以来的理想家都要用一大堆虚拟的材料来描述的，而王安忆的“乌托邦”只是通过两个人物之间的精神呼唤飘飘渺渺地就建立起来，作者把以陈映真为象征的理想主义和作家自己的精神自传紧紧结合在一起，谱写了知识分子理想之歌的五大乐章。第一乐章是“三角脸和小瘦丫头”，表达了知识分子应具备人类感情沟通的起点即爱心。第二乐章是“看美国足球”，表达了知识分子要有理性的思考精神，而这种以拒绝盲目与平庸为特征的理性力量，是与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苦难与忧郁紧密联系在一起。第三乐章是“做聪敏的孩子”，表达了知识分子只有站在自己民族的立场上发现经验和实践理想，才能保证理想的不空洞。第四乐章是“耶稣和信仰”，人都有自己的民族，而信仰却是跨越国界而属于全人类的。第五乐章是“感动”，这是知识分子回到民间去重新寻求力量而生的感动，因为理想信仰与民间是不能分开的。在五大乐章中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英雄，高高举起双手，握成了拳头，作成欢乐的鼓舞的手势的形象艺术地完成了。这五大乐章的主题正是王安忆面对知识分子90年代初所处的困境而作出的严肃思考，王安忆从形象的立场展示了当代知识分子应该承担的社会使命和历史使命。

王安忆经过对知识分子的揭示、反省和悼亡，到对知识分子人文精神重建理想的新生阶段，其精神内迹历历可见。王安忆在20世纪90年代的文坛人文精神普遍疲软时却试图重新捡起被时代碾碎了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话语，保持了自觉的知识分子身份意识，也正是由于这种自觉的知识分子身份意识，使她对知识分子的表现带有鲜明的主体化倾向，保持着同情与共生的基本立场，这种立场在《歌星日本来》与《乌托邦诗篇》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不过从总体上看，生活在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她必然会熟悉知识分子的种种局限与弱点，所以在《叔叔的故事》中她对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当知识分子在面临着尖锐的社会冲突时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和反省，但她始终确认识知识分子的社会精英地位，所以在《乌托邦诗篇》中王安忆从形象的立场展示了当代知识分子应该承担的社会使命和历史使命，这是王安忆知识分子身份与叙事主体身份合一的一部作品，我把它看作表现王安忆试图从精神上进行知识分子自我救赎努力的文本，从而使精神之旗帜高高飘扬在自己灵魂的上空，以慰藉自己，以吸引同道者。

另一方面从这三部作品的精神向度上看，王安忆的精神表现出困惑的迹象，这主要体现在叙事人暧昧的主观态度上。叙事人并不以为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相反与作品所建构的精神



世界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叔叔的故事》叙事人是一个持享乐主义态度的年轻作家，他最终是以自己“不再快乐”来否定自己的态度，提醒读者对精神失落的关注。《歌星日本来》的叙事人为了把自己与悼亡理想主义的人们区别开来，特意在结尾加了一段自我评价，表示自己是个十分平凡而现实的人，为了怕事情失败就宁可不做事情，她只是通过对于那些理想主义者刻骨铭心的纪念表明了自己的精神立场。《乌托邦诗篇》中叙事人不断地进行自我反省，以衬托陈映真的理想主义形象。这样我们就看到王安忆含混的精神世界，叙事人并不提供一个清晰可辩的理想主义图式，只是在叙事人与她的对应人物之间的关系中隐隐约约地表达出来。所以王安忆苦心营造的精神之塔只是一种非常抽象的甚至连作家本人也难以确切表达的精神之像，这反映了一个理性失范的时代给人的精神意识造成的巨大阴影。

王安忆试图高举精神之旗帜在时代的天空中呐喊以引来同道者，以抽象的精神性因素取代以人为中心的世俗文化，然而她的努力并未收到好的成效，相反这种精神追求却使王安忆陷入了“高处不胜寒”的境地，王安忆感到身心交瘁，力不胜任，她终于承认：“我们都是血肉之躯，无术分身，我们只能在时间和空间中占据一个位置，拥有两种现实谈何容易，我们使以消化一种现实为代价来创造另一种现实。有时候，我有一种将自己掏空的感觉，我在一种现实中培养积蓄的情感浇铸了这一现实，在那一种现实里，我便空荡荡。”王安忆天性中的“善意”使她不愿在虚无的状态中停留太久，从1995年起，她开始试图走出这样的精神阴影，走向一个新的精神载体。

